

卢梭和伏尔泰：新旧世界之交的两个巨人

——评《卢梭和伏尔泰》

裴程

歌德曾经说过：“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①短短一句话，切中了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关系的要害：他们俩同为新旧世界之交的历史巨人，启蒙运动的主将，距离不可谓不近；然而毕竟一旧、一新，着眼点不同，所以两人虽然同时叱咤欧洲文坛达半个世纪，相互却恍若隔世，其间距离又不可谓不远。加之他们各自的个性、共同的朋友圈子、生活际遇等因素，使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又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所以，自从伏尔泰和卢梭在1778年相继去世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了法国、乃至欧洲思想史界的热门话题。不仅像康德、歌德、柏格森、罗素这些大家有所论及，以此话题充当饭后茶余谈资的寻常文人骚客，也不乏其人。

在当今众多以伏尔泰和卢梭为题的论著中，亨利·古耶的《卢梭和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已经成为经典。这当然同作者资深识广分不开。从1898年12月出生，直至1994年3月去世，亨利·古耶享年96岁。他27岁开始讲授哲学，30岁任教授，其中在索邦大学任教长达二十七年，并于1979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古耶在漫长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生涯中，著作丰盛，仅专著就达五十多种，而且涉及面相当广泛，对奥古斯丁、笛卡尔、帕斯卡、马勒伯朗士、曼恩·德·比朗、孔德、柏格森、吉尔松等哲学家都有著述。《卢梭和伏尔泰》是他晚年的力作，说他是毕一生所学以饕后人也不为过。作者收集大量史料，遍览伏尔泰、卢梭以及当

^① 这句话被许多论著引用，其中包括法国《大百科全书》“伏尔泰”条目。但是本文作者经多方查询（包括向法国和瑞士的“歌德学院”咨询），未找到直接出处。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专家根据歌德同启蒙运动有关的论述推测，这一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概述。此注，敬请方家指点。

事人之间的书信；分析细致透彻，论证严谨；且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然而，本书之所以经典，关键还在于作者的立意：“研究者作自我审视”，暂时忘掉（或者用现象学的术语说：“悬置”）那些后世对伏尔泰和卢梭形成的观点，“制作‘伏尔泰眼里的卢梭’和‘卢梭眼里的伏尔泰’这两部影片”。

我们不妨把贯穿这两部“影片”的“剧情”，归纳为三个环节：哲学思想的分歧，社会地位的差异，日内瓦的纠纷。

众所周知，哲学史称的“启蒙运动”，与其说是某一种哲学流派，不如说是产生于欧洲18世纪的思潮。康德在1784年写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的精神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放出来。“Sapere aude！”勇敢地施展你的智慧！这就是康德为启蒙运动总结的口号。其实，在18世纪的“欧洲文学共和国”内，群星璀璨，众说纷纭。启蒙运动的精髓不在于“同一”，而在于各种差异思想在相互批判中形成“统一”的运动。“承认思想差异”和“提倡批判精神”，是欧洲社会经启蒙运动涤荡，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存在着哲学思想的分歧不足为奇。

尽管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也以“哲学家圈子”的朋友自诩，但是他真正的抱负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而如今，在伏尔泰丰厚的著作中^①，被阅读和引用最多的却是《查第格》、《天真汉》、《老实人》这些散文体的故事，这恐怕也是他当年没有料到的。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René Pomeau)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言之，这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②我们不妨在这些“结构松散”的思想中，把握来自两个方面的主要影响：一个是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的理性主义；另一个是牛顿的“第一推动力”说^③。崇尚理性、热爱科学，这是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最有力的武器。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伏尔泰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无疑是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

^① 法国国家图书馆1960年以前典藏印本总目录二百三十一卷中，伏尔泰著作近六千个条目，独占两卷。这是绝无仅有的。

^② René Pomeau, *Voltaire*, Seuil, 1994, p. 80, 以下简称为“René Pomeau”。

^③ 伏尔泰在英国期间就深受牛顿自然哲学原理影响，1734年住进西雷城堡后，又同情人夏特莱夫人一起研读牛顿。夏特莱夫人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拉丁文译成了法文。

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碎邪恶”。甚至说出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①这样激烈的话。他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基督教,而且触及一切形式的宗教狂(比如悲剧《穆罕默德》)。但是,同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不同,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并没有导致无神论。尽管他崇尚理性,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做人,就是施展理性”(他写《哲学辞典》,就是要“把理性按字母顺序排列”);然而他觉得,面对大千世界,人类理性显得微不足道。他说:牛顿虽然发现了万有引力,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地球的自转由西向东而不是相反^②。结论是:存在着一种超人的意志,它是人类智慧之光的来源。他在《自然宗教之诗》里,把人类的理性比做一只随时可能熄灭的火炬,而上帝之光则像燃烧的太阳^③。所以,伏尔泰接受了牛顿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个至上的存在,它是世界的“设计师”或“钟表匠”,它不仅给“世界挂钟”最初的动力,而且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避免“挂钟”停止摆动。这个世界的钟表匠就是自然神意义上的上帝。在《查第格》第十二章中,伏尔泰借主人翁之口,对因为各自的上帝争论不休的赛尔特、埃及、迦勒底人说:“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家都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无奈,或者用波莫的话说是因为对人类认识有限性的不满^④。“伏尔泰的上帝就是牛顿的上帝,它体现为宇宙的和谐,它关注理智,而不是情感。”^⑤换言之,伏尔泰的上帝,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理性”。

从自然宗教的角度看,卢梭可以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和伏尔泰最接近的一位。他和伏尔泰一样,认为要把真正的(自然的)宗教同历史的宗教区分开。基督教作为历史宗教的一种,败坏了人类自然的宗教信仰。卢梭借萨瓦牧师之口,对“神启”、“奇迹”、“原罪”等《圣经》中的基本信条质疑和批驳,并说从内心厌恶“一个和暴力连在一起的上帝”。这些看法,同伏尔泰的《五十人的说教》几乎如出一辙。难怪伏尔泰读了《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后,惊喜地说要把这本书“用羊革精装”。从他后来把《信仰告白》编入了1765年出版的《必读集》这件史实来看,当时的“惊喜”既非讽刺、亦非做作^⑥。和伏尔泰一样,卢梭并没有因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无神论,他相信至高、至善的上帝。而且,当他在《里斯本震災挽

诗》里发现伏尔泰对至高、至善的上帝产生怀疑和悲观失望时,毅然提笔给这位大文豪写信,维护自然宗教“一是善,或者说一切为一而善”的乐观观点。他还婉转地指出两人之间关于上帝存在的共识,甚至说:“我更偏爱您的基督徒方式,而不是索邦神学院的那一套。”但是,“共识”并不等于“同一”。和伏尔泰不同,卢梭并不认为基督教和自然宗教格格不入。萨瓦牧师所要抛弃的,是背叛了耶稣教导的真谛、作为历史宗教的基督教。所以,尽管卢梭两次易教^⑦,但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在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信中一再声称“我是真诚的基督徒”,并说明自己不是“某个神父的弟子,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这恰恰是伏尔泰不能理解的。

其实,在这个表面的对待基督教问题的分歧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自然宗教的出发点,这就涉及了卢梭哲学思想的根本。如果说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无奈,他的上帝是点燃理性火炬的太阳;那么,卢梭的上帝则是来自人类内心的呼唤。萨瓦牧师曾发出这样的咏叹:“意识,意识,神赋天性,上苍永恒之音,孤陋寡闻然而聪慧自由的人们的可靠指南,善恶分明的准绳,它使人同神相似……”^⑧注意,萨瓦牧师口里的“意识”不同于理性:“在灵魂的深处,有一个正义和道德的天赋原则……我把这个原则称为意识。”这就回到了1749年的“樊尚启示”和卢梭哲学思想的两本奠基著作:《论科学和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他在去樊尚堡看望被囚禁的狄德罗的路上,因读到第戎学院提出的关于科学、艺术的发展和道德的关系的论题,一时浮想联翩,以至喜极而泣。就在那一刻,他的“思想被千万条光束照亮”,“一个坚定的信念闯入他的思想”:“人性本是善良的”,是社会制度使人变恶。^⑨所以,在卢梭看来,这个使人能够超越自然,倾听上帝之音的“意识”,就是善良的本性。他晚年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把这种思想观点的转变称为由理性向情感的升华。所以,卢梭的自然宗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从这个意义出发,他对上帝的信仰不是因为对人类有限性的无奈或不满,而是出于对人类善良本性的信念和期望。

从“樊尚启示”开始,卢梭用另一种眼光来考察人类和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⑩作为《百科全书》的合作者和撰稿

① 古耶:《卢梭和伏尔泰》,第131页(原版页码)。以下本书引文只注页码。

② 《哲学辞典》,“人类意识的界限”:“冷酷的决策者、能说会道的教育家、博学的理论家,你要寻找自己意识的界限吗?它们就在你眼前。”

③ 参阅伏尔泰:《自然宗教之诗》第二章。

④ 参阅:René Pomeau, p. 86。

⑤ René Pomeau, p. 42。

⑥ 参阅第187—189页。

⑦ 1728年放弃加尔文教,皈依天主教;1754年荣归日内瓦时,又重新皈依加尔文教。

⑧ 《信仰告白》,转引自第256页。

⑨ 参阅第28页。

⑩ 《忏悔录》第八章。

人,卢梭不会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针对的与其说是“神学家”的圈子,不如说是“哲学家”的圈子。《论科学和艺术》从社会现状出发,揭露科学和艺术泯灭了人类纯洁、善良的自然本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非但没有升华人类的道德情操,相反,它们带来了狡诈、虚伪、屈从和争端。人类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奴隶。继《论科学和艺术》之后,卢梭又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进一步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文明怎样一步一步地把自然状态的人变成历史的人,怎样产生了私有制,怎样因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怎样由不平等产生各种人间恶的根源。纯粹的自然状态并非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纯自然状态的人甚至可能从未存在过。但是,“自然人”(或“原始人”)是论证“历史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和本体论前提。卢梭是在把文明赋予人类的属性一层一层剥去之后,才提出超越历史善恶之上的人类原型的。所以,“自然人”与其说是一种虚构的“历史起点”,不如说是卢梭对社会现状分析、解剖之后达到的“逻辑终点”。

在启蒙运动摧枯拉朽的时代,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批判,无疑是给“哲学家们”的一记棒喝。所以,在当时的法国,卢梭和伏尔泰的哲学观点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分歧。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绪论》中热情讴歌科学和艺术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指出《百科全书》的宗旨就是概述、普及和丰富科学和艺术。他还友善地指出,“一位颇富感召力的作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反对科学和艺术的观点”,只是“一时的失误”。

然而,分歧并非对立。毫无疑问,在揭露和批判超自然的神权对人类的奴役、确立人类自立地位的问题上,卢梭和伏尔泰以及“哲学家”们是一致的。他在1756年8月18日致伏尔泰的信中明确指出:“和您一样,我不能接受人们没有完全的信仰自由,不能接受有人竟然要控制属于个人的、别人不可干预的意识……即便这个人是国王,也不能接受。”^①但是,在为确立人的尊严而“粉碎邪恶”的战斗中,卢梭比伏尔泰和“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背后,看到的是人类“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的本质。换言之,在卢梭看来,人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超越现有的生存条件,完善自身的存在。这个观点已经很接近海德格尔以后关于技术问题的阐释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人类寻求完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卢梭尖锐地指出,人类并不能主宰“完善”行为的一切后果;非但如此,在一个领域里的进步,必不可免地伴随着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倒退。结论是:

① 第87页。

“善与恶同出一源。”^①

我们不妨透过这两种认识社会进步的不同观点,区分两种面对人类的不同立场。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在科学的旗帜之下,以人类理性(广义)的权威来批驳和取代宗教的权威,理性是普遍性的,所以科学的真理也必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卢梭则认为,任何使人类偏移自然本性的权威都是恶的根源;所以,人类一旦成为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奴隶,和受神权摆布同样可悲^②。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界通常认为,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思想最深刻、最富有现代精神的哲学家^③。

正如卢梭专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指出的,卢梭思想内部存在着“本体论的乐观”(人性本善)和“历史的悲观”(社会发展导致没落)的矛盾。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卢梭只是提出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卢梭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不仅认为人生来善良,而且坚信人是自由的。自由是卢梭对抗宿命论的有力武器。尽管他没有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从哲学上找到答案,但是他从教育(《爱弥儿》)、文学(《新爱洛漪丝》)和政治(《社会契约论》)等不同角度,勾画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爱弥儿”个性的自然发展、“朱丽”和“圣·普洛”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这一系列的努力,充分体现了卢梭思想的连贯性。

当然,真正从哲学上论证“纯粹理性”的完美、人类文化发展同自然和谐一致,这是康德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因为如此,康德这位理性主义大师才高度评价了卢梭的“批判理性”精神,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牛顿”^④。

二

“精神世界的牛顿”?假如当年伏尔泰听见康德这样评价卢梭,一定会说他和让-雅克一样疯了。因为,“伏尔泰生前一刻也没有想过,卢梭其书、其人将会在思想和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⑤。他对卢梭的最高评价不过是“天生小有才气”^⑥。历史上的卢梭和伏尔泰镜子里的卢梭的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和他们一开

① 卢梭:《关于道德、个体和社会的书信》,《卢梭全集》,第三卷,伽利玛出版社。

② “荒唐的人类呵,你们不停地抱怨自然,听着,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身!”，《忏悔录》第八卷, Gallimard, Folio classique, Paris, 2003, p. 473。下引《忏悔录》皆为该版。

③ 参阅: Jean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Gallimard, Paris, 1957; Tzvetan Todorov, *L'esprit des Lumières*, Robert Laffont, Paris, 2006。

④ 转引自: *Encyclopédie universalis*, “Rousseau”。

⑤ 第10页。

⑥ 第174页。

始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分不开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是造成伏尔泰对卢梭的误读和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伏尔泰比卢梭年长 18 岁,而且成名很早,尤其在戏剧界。他 24 岁就以悲剧《哀狄普斯》轰动剧坛,从此更名为“伏尔泰”。据法兰西喜剧院的档案记载,伏尔泰剧作的上演次数,在 1930 年代赶上高乃伊、1940 年代超过了拉辛^②。他于 1746 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并被路易十五指定为“宫廷史官”,获“国王内宫侍从”的头衔。波莫曾经幽默地说:伏尔泰在知命之年已经获得了一切,“自从《梅洛普》的巨大成功之后(1743 年),他几乎辍笔。他只需享受、等待死亡”。若不是夏特莱夫人英年早逝,伏尔泰的生平可能就此为止^③。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伏尔泰当时在法国文坛的地位。与他相比,卢梭在巴黎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外乡人”——“日内瓦卢梭”,仅以《百科全书》“音乐篇”撰稿人的身份出入一些文学沙龙。这种社会地位的差距造成伏尔泰从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地俯视卢梭。

当伏尔泰收到卢梭寄去的《论科学和艺术》时,他正在伯茨坦做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幕僚,兼法国文学老师。他深居普鲁士王宫,根本不介意一本“小学生的命题作文”^④,甚至没有觉得有给作者回信表示谢意的必要。直至 1755 年 8 月收到《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方才回信致谢,措辞调弄,说出了那一番被后人一再引用的讥诮话:“先生,我收到了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已逾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很遗憾。”^⑤诚然,文笔幽默是伏尔泰的一大特色。波莫这样认为:“在伏尔泰的笔下,严肃常常以玩笑的方式体现;然而,不带一丝严肃的玩笑,是很少见的。”^⑥那么在这一番针对让-雅克的玩笑中,我们能找到什么严肃的内容呢?那就是对卢梭两本奠基性论文的误读。

斯塔罗宾斯基指出:让人类倒退到“四足爬行”的自然状态,这是人们经常轻易强加给卢梭的错误理解。在卢梭“煞费苦心”寻找的答案中,唯一排除的,就是“与禽兽同类”^⑦。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伏尔泰是此类误解的第一人呢?以他当时

的社会地位和操虑^①,卢梭的确不可能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当时很可能只是浏览了卢梭的两本论文(亨利·古耶甚至根据回信的内容,提出伏尔泰当时是否已经读了第二本论文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伏尔泰一开始对卢梭两本论文的误读和误解,是导致他以后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卢梭的“原罪”?否则我们怎样解释:伏尔泰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大文豪、大史学家,竟然没有对卢梭当时就引起轰动的一系列传世名篇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②?

卢梭则不同,从青年时代起,伏尔泰就是他心目中的泰山北斗,他只能自下而上地仰望伏尔泰。《哲学书简》激发和培养了他的研究兴趣,《阿尔齐尔》曾经使他“被感动得差一点没有喘过气来”^③……伏尔泰在青年卢梭的心目中,无异于精神上的导师。这一点,他在《忏悔录》中也直言不讳。卢梭在 1745 年 12 月 11 日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能得到您对小有才华的后起之秀的提挈。”^④这一句话是理解卢梭眼里的伏尔泰的关键。我们可以认为,在 1756 年 8 月 18 日卢梭因《里斯本震灾挽诗》致伏尔泰信之前,他一直在“发愤努力”,以博得大文豪的关注。当他以“两论”的作者身份,在 1756 年的信中直接和伏尔泰讨论神意问题时,恭敬的措辞背后,俨然有和大师分庭抗礼的架势。他直截了当地拿自己和伏尔泰相对照,指出:伏尔泰荣华富贵却举目皆恶,他虽然穷困潦倒,却举目皆善;结论是:“您享受快乐,我抱有希望,期待使一切变得光彩夺目。”^⑤《爱弥儿》、《新爱洛漪丝》、《社会契约论》等著作的发表,使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同伏尔泰的差距越来越小。然而恰如亨利·古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伏尔泰始终没有察觉到这个差距在减小。对此,波莫曾经提出过两个原因:一是衰老难免固执己见,二是长期远离当时的欧洲文化中心巴黎,对卢梭在思想界的真正影响不甚了解。^⑥这样就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对话方式:一方漫不经心、“无心恋战”;另一方则一丝不苟,越来越“咄咄逼人”。

可以想象,一个成功的学生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和赏识,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既然卢梭要博得伏尔泰的关注,那么一定会对他的反应很在意,更何况让-雅

① 根据古耶书中提供的史料,伏尔泰读过卢梭生前发表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

② 参阅:Zair, *Le Fanatisme ou Mohamet le Prophète, Nanine ou l'Homme sans préjugé, Le Café ou l'Ecosaise, "Intruducton"* par Jean Goldwink, GF Flammarion, Paris, 2004。

③ René Pomeau, p. 21.

④ 参阅第 35 页。

⑤ 第 54 页。

⑥ René Pomeau, p. 15.

⑦ 参阅: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TII, Jean Star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Gallimard, "Encyclopédie de Pléiade", Paris, 1973。

① 1753 年初,伏尔泰同弗里德里希二世闹翻后离开伯茨坦暂时寄居于萨克斯-戈达公爵夫人家;于 1755 年搬到日内瓦,入住“德里斯”。

② 狄德罗曾经为卢梭第一篇论文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他说:“它超尘脱俗;它的成功绝无仅有。”(转引自:《忏悔录》第八卷, p. 444。)同狄德罗相比,伏尔泰是何等麻木?若非误读误解,实匪夷所思。

③ 第 22 页。

④ 第 12 页。

⑤ 第 78 页。

⑥ 参阅: René Pomeau, *Voltaire en son temps*, vol. III, "Ecraser l'infame", Voltaire Foundation, Oxford, 1994, p. 178。以下简称为“Ecraser l'infame”。

克生性多疑,对别人的看法十分敏感(他晚年所作,无一不是要给后人解剖自己,作一个交待)。然而大文豪却以“玩笑”来打发两本论文。卢梭的回答虽然也不乏幽默(“切莫四足爬行:这世上谁都会比您强”),但仍然充满了对“老师”的敬仰:“您教导我们大家都挺直腰板、站稳脚跟,您自己就更应当身体力行。”^①我们难道不能在这一句落地有声的赞美中听到一丝失望的叹息吗?让-雅克是否想到了那一位享受荣华富贵、为了“附庸风雅”而“牺牲了阳刚之美”的“闻名遐迩的阿鲁埃”呢?这一丝叹息,到了1756年致伏尔泰的信后,变得简直有些悲凉。不错,伏尔泰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函,使原本战战兢兢的卢梭如释重负。然而,卢梭所期待的,不是起居寒暄,而是就神意和自然宗教问题,同伏尔泰展开真正的讨论。遗憾的是,大师推托疾病缠身,“待到我康复之后才敢与君对坪而论”。但是卢梭的期待如石沉大海,在伏尔泰来信的末尾,他无可奈何地留下一句:“他从此再没有给我写过信。”直至写《忏悔录》时,他对大师的允诺仍然念念不忘,竟然臆测《老实人》是伏尔泰为应答他关于神意的讨论而作。

三

如若不是因为被卷入日内瓦的政界纠纷,伏尔泰也许永远不会把卢梭放在眼里,而卢梭也不至于对自己一直仰慕的大文豪发出“我恨你!”那样的怒叱。

卢梭和伏尔泰除了可能在1750年1至6月间巴黎的某个沙龙匆匆见过一面外^②,再没有会晤过。生活的际遇使“日内瓦卢梭”成了巴黎人,而十足的巴黎“上流社会人”伏尔泰则反客为主地成了日内瓦人。所以,他们在日内瓦辞辩锋起地“狭路相逢”是在所难免的。

从政治立场上说,伏尔泰代表的是开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维护君主制,反对民主共和制。他认为“人民缺乏思想”、“幼稚”、“盲从”,“不配独立自主”。^③这些观点和代表平民阶层的卢梭的民主共和思想是格格不入的。难怪伏尔泰在读了“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愤愤地批了一句:“穷鬼哲学”;称《社会契约论》是“反社会契约论”,矛头直指君主制度。

从社会阶层上说,伏尔泰本人就是家资万贯的大富豪。他早年靠做军用物资生意发了财。晚年在日内瓦城边的费尔奈安居,开荒、筑教堂、建学校、设剧院,二十年内,把一个原来只有一百来口人的小村落,变成了一个近千口人的“伏

尔泰王国”。和富甲一方的“费尔奈领主”相比,卢梭的确是“穷鬼”。他一辈子生活拮据,做过音乐家教、秘书;成名后,抄乐谱和稿费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他甚至遇到过“一个苏一个苏”地向出版商索要稿费的窘况^④。

伏尔泰和卢梭都同贵族有交往,但是性质截然不同。在伏尔泰的贵族朋友圈子里,他被尊为“当代拉辛”、史学家和文豪,“宫廷史官”、“国王内宫侍从”、“普鲁士国王幕僚”等头衔足以证。而卢梭和贵族朋友的接触,则多为寄人篱下、寻求庇护。他在隐庐受德比内夫人先纳后逐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无论伏尔泰和卢梭愿意与否,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和社会阶层上的差别,必然会反映到各自对日内瓦社会的分析和认识之中。

从18世纪初起,日内瓦共和国就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之中。当时,日内瓦市民分四个阶层:外乡居民(habitant)、本地居民(natif,在日内瓦出生的外乡居民的后裔)、自由民(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自由民的后嗣获公民身份)。只有自由民和公民才享有政治权利:国民议会选举议员和市政代表(其中一名首席代表)。除此之外,他们还享有特定的经济待遇,比如:在各自的行业中获得“师傅”的资格,可独立经营等。外乡居民和本地居民若要获得自由民身份,必须出金赎买。这个形成于16世纪的制度,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危机。

一方面来自自由民和公民内部。一小部分上层新贵逐渐把持了立法(“两百人议会”,又称“大议会”)和执法(“二十五人议会”,又称“小议会”)两大机构。国民议会的权力受到威胁,并多次被践踏。不仅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使日内瓦新贵们和法国的宫廷贵族联系密切,小议会的某些决策直接受凡尔赛宫的影响。这就引起自由民和公民对上层新贵的不满。

另一方面来自“居民”阶层。到18世纪初,“居民”人数已超过日内瓦市民的半数。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放松经济上的限制。

1707年因国民议会的权力问题,发生了自由民和公民抗议运动。1737年,因小议会擅自决定增税而引起市民暴动,参加者不仅有自由民和公民,而且还有“居民”。最后由法国王室出面干预,才达成“调停协议”。新贵们不得不重新确认国民议会的权力(包括立法权),并放宽了对“居民”的某些经济限制(比如可获得“师傅”的资格)。

伏尔泰和卢梭就是在这样一个日内瓦中“遭遇”的。

① 第66页。

② 参阅第7页。

③ 参阅:René Pomeau, pp. 75-77。

④ 参阅:《忏悔录》第八卷,第448页。

卢梭于1754年6月曾经荣归故里,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共和主义的热烈气氛、各界人士对他的盛情和爱戴高涨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重新皈依加尔文教,而且被庄重地恢复了日内瓦公民权^①。由此,他曾经一度打算回日内瓦定居。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对此,卢梭在《忏悔录》里谈到过三点原因:其一是因为《起源》一书给日内瓦共和国的献辞遭到日内瓦上层的冷遇;其二是德比内夫人为他提供了“天造地设的藏身之地”——隐庐;其三就是伏尔泰安居日内瓦附近的德里斯:“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我若回去,难免在自己的祖国遇到令我望而生畏的巴黎的腔调、气氛和习俗,我又得论战不休;我的行为将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或者当胆小怕事的坏公民。”^②可见,卢梭对伏尔泰在日内瓦的作为,早有戒心。

1757年11月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七卷里发表的《日内瓦》一文,成了“日内瓦纠纷”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包含了两个方面有争议的内容:一方面涉及日内瓦牧师们的新教信仰;另一方面就是在日内瓦开剧院的倡议。卢梭当然知道,这篇文章的背后是伏尔泰^③。向它发难,就是向伏尔泰挑战。不过他无意在新教信仰问题上多作纠缠。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对传统基督教的批判立场,其实同伏尔泰很接近。所以他对牧师们提出的《抗议书》不置可否。但是戏剧问题不仅触及他的基本哲学思想,而且证实他对伏尔泰定居日内瓦的担忧。他从日内瓦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自从伏尔泰定居日内瓦后,在德里斯、蒙利塘频繁组织演出话剧。许多日内瓦上层人物到场观看(比如特隆善家族),甚至参加演出(维拉尔公爵曾扮演《中国孤儿》里的成吉思汗)。这些上层社会的文娱活动,触及了日内瓦中下层市民的宗教和道德情感,闹得满城风雨。穆尔图牧师在给卢梭的信中言辞激烈:“富人们……长期腐化堕落”,只有穷人阶层才保持着“共和的德操”。^④于是,卢梭以“日内瓦公民”的名义,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利益,给大名鼎鼎的达兰贝尔写了著名的《关于戏剧的信》。他在信中根据自己的一贯思想,不仅指出了戏剧对日内瓦民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而且揭露上层统治集团可能利用这种形势左右民意的危险性。

《关于戏剧的信》的发表,在日内瓦引起了巨大反响。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建立剧院的问题,日内瓦形成了“伏尔泰派”和“卢梭派”的对立。这种对立很快

超出了戏剧的范畴,涉及宗教、伦理和政治的领域。然而伏尔泰起初对这封信的反应仍然是“漫不经心”,认为信中回答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他说:“那不过是让-雅克的又一次胡闹”,“让-雅克说在日内瓦不合适开剧院,我却要开一个”。^①

和伏尔泰不同,卢梭却一直关注着日内瓦事态的发展。但是从一些日内瓦朋友的来信中,卢梭逐渐意识到,他原来对日内瓦现状的看法过于理想化,日内瓦的民风早已今非昔比。可以说在1758年9月《关于戏剧的信》发表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卢梭对日内瓦的认识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变。最后他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创伤已经无可救药”^②这个事实。在卢梭眼里,他和伏尔泰之间的哲学分歧已经上升为道德的决裂。伏尔泰成了使日内瓦远离自然之善、向文明之恶堕落的象征。于是“我恨你”就不可避免了:“先生,我根本不喜欢你……你断送了日内瓦……你使我的同胞和我离异……你使我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容身;你逼得我要客死他乡……我恨你!”^③

波莫认为:伏尔泰和卢梭之间的关系恶化是由这封信引起的,所以起因在卢梭^④。其实不尽然。如上所述,伏尔泰对卢梭其人其书一直不放在眼里。用今天的话说,卢梭从未进入他的“关系网”。既无“关系”,又何谈“恶化”呢?所以,即使在收到这封“绝交信”后,伏尔泰也只是“耸耸肩膀”,仍然用调侃的语气对朋友们说:“让-雅克竟然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疯。”^⑤而从卢梭的角度来看,他对伏尔泰从敬仰到失望直至恨,有一个逻辑的演变过程。当然无论是“恨”还是“失望”都不能抹杀他心目中敬仰的“导师”。而且“导师”越是伟大,他对“伏尔泰”的“恨”就越是彻底。对卢梭这一种微妙的心理状态,亨利·古耶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证明。我们可以认为,“我恨你!”标志着卢梭和伏尔泰相互对视方法的反差的极点。从此以后,卢梭曾一度进入伏尔泰视角的焦点,终于受到大师的“关注”。然而“关注”的结果却是:伏尔泰那一支18世纪“最优美的笔”^⑥给让-雅克带来了重创。

1760年12月,在一部分接近中下层市民的牧师代表的敦促下,大议会通过宗教委员会的提案,禁止日内瓦人参加在德里斯和图尔奈举办的演出,重申在共和国境内严禁戏剧。一部分市民甚至在德里斯张贴辱骂标语。尽管伏尔泰受到

① 卢梭于1728年4月皈依天主教,并同时失去日内瓦公民的资格。

② 参阅:《忏悔录》第八卷,第481页。

③ 达兰贝尔在写此文之前,曾去费尔奈拜访伏尔泰。狄德罗也曾向卢梭透露:“该文章的内容曾经和日内瓦上层商量过。”参阅:第111、116、118页。

④ 参阅:第128页。

① 参阅第136、138页。

② 第145页。

③ 1760年6月17日卢梭致伏尔泰。卢梭在《忏悔录》第十卷中全文抄录此信。参阅:第141页。

④ 参阅: *Ecraser l'infame*, p. 165.

⑤ 第151页。

⑥ 卢梭的评价,参阅:第225页。

日内瓦上层的保护(总检查长让-罗贝尔·特隆善就曾宽慰他“不用担心”),但是他还是感到了来自“五金商和鞋匠”们的压力,并认定卢梭是这一帮“贱民”的后台^①。“戏剧事件”从此带上了政治色彩。卢梭因“卢梭派”的喧闹而进入伏尔泰的视野。此时恰逢《新爱洛漪丝》问世,伏尔泰当即匿名发表《关于新爱洛漪丝致伏尔泰先生的信》。这是伏尔泰第一次“认真评论”卢梭的作品。有趣的是,他又一次误读了让-雅克,竟然一点也觉察不到这部“让全巴黎的女人为之流泪”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断言:“这本书若是成功了,那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耻辱。”^②

1762年4月和5月,《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先后问世。6月9日,巴黎最高法院下令将这两本书“撕毁”、“焚烧”,并逮捕作者。6月19日,日内瓦小议会也作出同样的判决。这一事件,更加重了伏尔泰和卢梭对立的政治气氛。以毕克泰中校为代表的一部分日内瓦市民不仅对小议会的决定表示不满,而且指责伏尔泰从中起了作用。卢梭本人也持此见。亨利·古耶认为:“这个指控除了貌似真实外,没有其他根据。”^③波莫则认为“连貌似真实也言过其实”^④。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伏尔泰是否直接被牵连到小议会的决定已经不重要^⑤,关键是这个决定加剧了“卢梭派”和“伏尔泰派”的对立。更有甚者,一些“卢梭派”人士指责小议会对伏尔泰的袒护,对他的反基督教著作不加理会,却要焚毁像《社会契约论》这样一座“为自由而战的弹药库”^⑥。这样就把伏尔泰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

1763年5月,卢梭对日内瓦彻底失望,宣布放弃日内瓦公民的身份。拥护卢梭的市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多次有组织地向首席代表和小议会提出“抗议”,史称“抗议派”。小议会和市政代表则依据宪法,对“抗议”行使“否决权”,史称“否决派”。由此,卢梭和伏尔泰的纠纷就完全被卷入了日内瓦内部的政治冲突。为了给小议会的决定辩护,总检查长让-罗贝尔·特隆善发表了《乡间来信》。卢梭立即以《山中来信》回敬。他在信中抨击小议会的独裁专制,还指责伏尔泰一面和迫害自己的人们沆瀣一气,一面却匿名发表像《五十人的说教》这样的反基督教文章。

这一次伏尔泰被真正激怒了。他瞄准卢梭,穷追不舍:《公民们的感情》、《关

于奇迹问题》、《彼得大帝和让-雅克·卢梭》、《伏尔泰先生致让-雅克·邦索夫博士的信》、《致休谟先生的信》、《致休谟先生的信的批注》、《日内瓦内战》……连篇累牍地对卢梭发起进攻。不得不承认,盛怒之下出不了好文章。伏尔泰继续沿着误读、误解的思路,挖苦和批驳卢梭的著作。更有甚者,他开始揭露隐私,对让-雅克进行人身攻击。有些凌辱的言辞,连为伏尔泰立传的史家都感到汗颜。当波莫读到“若是偶尔欲火暗燃,两具骷髅尖骨相撞,唯一使他们晕厥的快感,就是贻害人类”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伏尔泰笔下最黑暗的一页,史家们有义务为“让-雅克和泰蕾兹讨个公道”^①。难怪孔多塞会说:伏尔泰的思想和行为是如此非凡,“要不是他对卢梭的一点点不公正……使人们感到他还是一个人的话,人们简直会相信他是一个神”^②。

公正地说,伏尔泰晚期关于卢梭的著述,除了给后人了解18世纪文坛这一段纠纷提供一些史料外,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公民们的感情》又当别论。伏尔泰在这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中,第一次把卢梭遗弃孩子的隐私公诸于世。这的确触到了卢梭的痛处。他终于决定要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让后世评判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于是人类文化宝库中,又多了一本不朽的名篇《忏悔录》。有趣的是,卢梭始终否认《公民们的感情》出自伏尔泰之手,理由是:文章牧师腔调十足,远不如伏尔泰的文笔优美……^③

伏尔泰在用笔杆子对付卢梭的同时,在日内瓦政界也不甘寂寞。波莫说过:“伏尔泰生来就是一个干政治的,他一生都不停地用著述或其他方式组织和策划计谋,朝着一定的方向引导人们的思想。”^④就在“抗议派”和“否决派”的对立处于僵局、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伏尔泰利用自己在法国和日内瓦上层的关系,主动承担调解人的角色。一时间,卢梭的一些朋友成了费尔奈的座上宾。主人力图通过“晚宴政治”再一次“引导”对立双方的思想。他甚至还在费尔奈接待过日内瓦最底层的“居民”代表,替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他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捐弃前嫌、改变政治倾向,而是又一次“组织和策划计谋”之举。一方面,伏尔泰要在政界做“让-雅克的对头”,“起和让-雅克完全对立的作用,熄灭他用那两片可怜的小肺叶竭力扇燃的火苗”。^⑤所谓“火苗”,就是《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事件引起的市民骚动和对小议会提出的“抗议”。于是,他借此机会拉拢“卢梭派”的

① 参阅: *Ecraser l'infame*, p. 166.

② 第159页。

③ 第178页。

④ *Ecraser l'infame*, p. 170.

⑤ 值得一提的是,1762年3月底爆发了“卡拉斯事件”,伏尔泰当时正高举“人权卫士”的旗帜,为卡拉斯遗孀鸣冤不平。说他同时参与“迫害”另一个被巴黎当局追捕的落难者,似乎情理难通。

⑥ *Ecraser l'infame*, p. 309.

① *Ecraser l'infame*, p. 323.

② 第336页。

③ 参阅: 第220—226页。

④ René Pomeau, p. 70.

⑤ 第208页。

首脑,让他们相信:“日内瓦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卢梭,要重新获得安宁,就必须将他忘掉。另一方面,他深知波旁王室希望日内瓦稳定,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出兵保护小议会。“1737年民变”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调解”是代表了法国上层的意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场纠纷中,我不想参与任何一派。国王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①他还毫不隐讳地向对立双方明示,自己的后台就是路易十五的战争和海军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以及代理外务大臣普拉兰公爵。

然而“调解”最终失败。1767年1月,法国王家龙骑军兵困日内瓦以示威慑。费尔奈也因此受到牵连,闹得鸡犬不宁。恼羞成怒的伏尔泰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卢梭和他的拥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几个钟表匠和制绒商受让-雅克鼓动,头脑发热所致。”^②鄙弃衍溢辞表。相反,早已对日内瓦心灰意冷的卢梭,则写信赞扬“钟表匠和制绒商们”“置生死于不顾”的义举,并认为“应当载入史册”。^③

伏尔泰毕竟属于“巴黎上流社会人”。

卢梭终究还是“日内瓦公民”。

① 第313页。

② 第314页。

③ 第312页。